

第一章 俄罗斯在北极 争夺中的妥协

摘要：2007年，俄罗斯北极插旗事件引来大量媒体关注以及对北极的政治兴趣，一场北极争夺赛悄然来临，而俄罗斯是关键影响因素。本章聚焦于俄罗斯国内对挪俄签订《巴伦支海划界协议》的批评之声，该协议签订于2010年，将两国有主权争议的海域均分为两个部分。批评者请求总统普京建立国际专家委员会评估该协议的有效性。国际协议不可能因委员会或专家的意见而废除，所以问题并不在于普京该如何重申俄在巴伦支海的主权，而是他为何应收回巴伦支海。

2007年8月，俄罗斯北极科考队在北极点海床插下一面钛合金国旗。因俄罗斯将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出主权申请，科考队为此收集资料，然而该事件被普遍视为俄罗斯在北极的“肌肉秀”。与此同时，夏季北极冰盖大量融化，国际上对北极油气商业开采的兴趣越来越大。学者斯科特·G. 博格森（Scott G. Borgerson）在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北极融化》（*Arctic Meltdown*）^①中提到：“北冰洋正以极快的速度融化……北极通航以及自然资源开采已经不是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时间问题。”^②但情况也可能变得极为危险，他补充道，“因为现今没有主导的政治、法律框架，无法保障北极发展有序进行，也无法调解因北极资源或航道问题产生的争议。”^③“因此，北极国家可能采取单边行动尽可能地攫取领土并控制更多公海航道。对于这片法律上的无人地带，北极国家将通过设置声呐网、装备破冰船来保障他们的主权主张，追

① 斯科特·G. 博格森（2008）：《北极融化：全球变暖的经济、安全启示》，《外交事务》，87期，第63-77页。

② 斯科特·G. 博格森（2008）：《北极融化：全球变暖的经济、安全启示》，《外交事务》，87期，第63页。

③ 斯科特·G. 博格森（2008）：《北极融化：全球变暖的经济、安全启示》，《外交事务》，87期，第71页。

求其狭隘的国家利益。”^①

俄罗斯的插旗行为以及博格森的文章使媒体对北极的关注和外界对北极的政治兴趣空前高涨。很多人看来，俄罗斯对于北极点的主权声明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异议。北极竞争已经开始，俄罗斯则是关键因素。一方面，北冰洋沿岸其他北极国家关系良好，包括加拿大、丹麦（格陵兰）、挪威和美国，北约成员国的共同身份使他们保持着良好的战略合作。另一方面，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国，苏联在冷战时期是北约公开宣称的敌人。俄罗斯事务缺乏透明度，正如丘吉尔所说，苏联是“谜中之谜”。在俄罗斯的多重国家身份中，北方国家是一个重要身份，提起俄罗斯，都会想到白雪、漫长冬季和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森林。一些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可以不管国际法和文明政治行为主导的其他准则，在北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而很大程度上，北极的紧张局势正是俄罗斯北极意图引起的。

*

*

*

2012年冬末^②，《普京该如何收回巴伦支海》的文章登上了多份俄罗斯报纸头条。^③作者希望立即撤销两国2010年协议划定的边界，也认为国际社会是时候面对挪威及挪威对斯瓦尔巴德周边水域的管理。冬去春来，这篇文章也吸引了很多挪威媒体的注意，有人认为这说明与“俄罗斯熊”为邻，挪威要做最坏的打算，做好防卫准备。文章的观点相当古怪反常，甚至充满误解。对于如此明显的谬论该作何评论呢？首先需弄清楚，海洋划界协议是两个主权国家间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它与海洋法的原则一致，不能随意退出。

该文章引用的大部分内容来自于苏联渔业部副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兹兰诺夫（Vyacheslav Zilanov），如今他是俄罗斯西北部著名的政治评论家。兹兰诺夫极力反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对挪政策，他认为扩大了俄罗斯的劣势。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像一个睿智、和蔼的祖父，也是挪威的朋友。令他恼怒的并非挪威人，而是他本国的同胞。俄罗斯人鲁莽地踏入挪威的陷阱，签署了不符

^① 斯科特·G. 博格森（2008）：《北极融化：全球变暖的经济、安全启示》，《外交事务》，87期，第73-74页。

^② 原文“2013年冬末”有误。——译者注。

^③ 参见《普京早已在巴伦支海？》，《太平洋公告》，2013年2月13日。

合俄罗斯最大利益的协议，例如捕捞限额制度以及新的渔业管控标准（见第二章）。有经验、有预见力且十分睿智的挪威人引导着全局，俄罗斯人却在“海外购物之旅”途中打着瞌睡（俄罗斯委婉的说法：在国际会议中消磨时间）。如今更糟糕的是，俄挪签署的划界协议让俄罗斯输掉了巴伦支海域的油气资源。

* * *

挪方称颂 2010 年划界协议是经典案例，体现友好国家齐心协力可以达成保护双方利益的妥协。但俄罗斯人却没有表现出相同的热情，摩尔曼斯克以及莫斯科的渔业界对此灰心丧气。他们认为俄方代表尽其所能满足挪威的一切要求却忽视了俄罗斯的利益。2011 年以微弱多数通过该协议的国家杜马成员也批评：事实上，协议通过仅仅是因为总统的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为该协议投了票，其他政党均在投票中弃权。

对该协议的批评并未平息反而愈演愈烈，在该文章的作者和许多俄罗斯媒体看来，俄罗斯的谈判代表有疏忽之罪。“在与挪威的谈判中，俄罗斯代表未能提出：根据 1920 年《斯瓦尔巴德协议》，俄罗斯对一条海岸线的归属具有优先权；没有提及 1926 年确定的俄罗斯北极区域历史边界；也没有提出其他符合俄罗斯利益的论据。”换言之，所谓的两个平等国家签订的协议，事实上是俄罗斯自愿将本可归属俄方的水域让给挪威。这“惊人”的协议可以轻易叫停整个巴伦支海西部的渔业捕捞，这是俄罗斯鱼类资源最多的区域，一旦禁止捕捞，俄罗斯就只剩东边鱼类较少的水域。该协议也使得挪威可以对进入斯瓦尔巴德保护区中的俄罗斯捕捞船加大限制。挪威于 1977 年单方面成立该保护区，莫斯科从未承认其合法性。批评者们没有解释的问题是，这份划界协议如何引发了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个问题（见第三章）。

兹兰诺夫认为该协议不仅使俄罗斯遭受巨大经济损失，而且显然也有失公平。他想为总统提供一份如何收回巴伦支海的路线图。首先，需要任命一个由俄罗斯专家以及国外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依据来评估该协议是否合理。当委员会得出结论后，总统可以考虑是否要修订甚至废止该协议。《斯瓦尔巴德条约》原签署国应该召开一次新“斯匹次卑尔根会议”（Spitsbergen Conference），评估挪威设立的斯瓦尔巴德群岛周边渔业保护区是否具有合法性。这两个想法在挪威人看来都极具争议。如前所述，基于国际法原

则划分两国之间海域的划界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国家议会当然不会批准所有条约，但迄今为止也未曾有国家议会废止条约。同样，一般也不会指派委员会依据国际法来评估协议的合理性。国家可以接受任何边界划分方式，但一旦协议生效国家必须给予尊重。签约一方不愿遵守该协议，如果协议里有退出程序可以退出。然而通常情况，协议双方不会选择修改条约，甚至费力地废止条约。如果存在解释争议，在双方均同意诉诸法庭或协议事先约定的情况下，相关方可以将纠纷提交至国际法庭，类似海牙国际法庭这样的机构便可裁决案件。协议是否符合国际法准则应由法庭裁决，而不是兹兰诺夫提议的国际专家委员会。此外，尽管对于是否将条约应用于斯瓦尔巴德群岛附近水域仍有争议（见第二章），但从政治角度说，提议召开新“斯匹次卑尔根会议”是激进的策略。路线图中所提出的诸多观点并不代表莫斯科的官方政策，因此，问题不是普京该如何收回巴伦支海，而是他为何应该想要收回该海域。

前任总统、如今任职总理的梅德韦杰夫受到很多含沙射影的批评，文章开篇指出“该协议签署于梅德韦杰夫任职总统的 2010 年”，俄罗斯“输掉大面积渔场”。接着写道，“梅德韦杰夫批准的协议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义和公平的基本原则”，“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大众需要普京这样的政治强人”。文章建议，“普京，清理梅德韦杰夫留下的乱局吧！”在普通大众眼中，该文章对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描述是事实的混合和普通的政治观点。俄挪签署协议时，梅德韦杰夫恰好任职总统，如今是普京任总统。该协议是一桩糟糕的交易——即是故事的结局。但作为熟悉俄罗斯事务的观察者来说，故事远不止于此。文章作者本不需要提及各位总统的名字，也无需强调他们在该事件中的角色。梅德韦杰夫本人并未参与谈判，可能仅在 2010 年 4 月的几天里，为在奥斯陆签署协议做些准备工作。作者本可要求俄罗斯政府重新查看该协议，而不需要呼吁普京本人来做此事。文章字里行间传达出梅德韦杰夫与西方世界（这里指挪威）友好关系的联系，说得好听是指责梅德韦杰夫天真，不好听则是叛国。显然，如今的普京绝不会投降。许多俄罗斯人更喜欢政治强人掌控全局，强硬的普京要胜过头脑聪明却软弱的梅德韦杰夫。更重要的是，普京是真正的俄罗斯人，许多人称他为理想的俄罗斯人。一位女歌手在普京第一任期为他献唱一首反映俄罗斯人感情的歌曲。“俄罗斯人陷入绝望”，她歌唱道，“我想要像普京一样的

男人，他充满力量，远离酒精。”^① 如今，梅德韦杰夫在人们心中虽然不是酒鬼，但是许多俄罗斯人觉得与他很疏远。就像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一样，撒切尔夫夫人第一次会面后，评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可以一起做生意的人”^②。俄罗斯人能否信任一个与外国人相处如此融洽的人？梅德韦杰夫真是他们中的一员吗？

*

*

*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在莫斯科见过兹兰诺夫，他为普京设计了收回巴伦支海的路线图。他曾是俄罗斯议会的渔业顾问，那时我是一名研究俄罗斯渔业管理的年轻社会科学家，有几年也为挪威海岸警卫队和渔业部门做俄语翻译。兹兰诺夫讨人喜欢、风趣包容、乐于助人。当我还是译员时，已经习惯了被兹兰诺夫这样级别的人烦扰，说实话，当我成为研究员之后这样的情况也并未改变。在苏联的政府机构中，一般由长者出任高级职务。苏联崩溃带走了他们昔日的威望，他们不愿意看到西方蜂拥而入新俄罗斯的年轻人，这些人做的任何事都会令他们不快。我很快意识到，译员这份工作在俄罗斯人看来是卑贱的，与端咖啡的服务生无异。说流利的俄语也不能赢得尊重。俄罗斯人特别希望来自苏联加盟共和国和附属国的人们至少可以使用联邦的主要语言，让俄罗斯人听懂他们的意思。他们不会轻易被语言能力打动，对大批西方人来到俄罗斯而感到生气。我曾在访谈中见过一个极端案例，一位来自圣彼得堡的年长医生对说俄语的西方人感到恼怒（采访在有火药味的气氛中结束）。这位医生参加了一个挪俄联合卫生项目，他认为这个国家曾拥有引以为傲的苏联医疗保健制度，如今却要接受一个西北小国的帮助，这令人感到羞耻。几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挪威人询问“与挪威合作的好处”时，医生模仿我们的口吻：“告诉你们，我所知最糟糕的事就是来到俄罗斯的外国人试图说俄语！”^③ 离开访谈的宾馆房间后，医生旁若无人地点了一根烟，然后咧嘴一笑。住在宾馆的同事后来发现医生出去的时候拿了一些房间的东西，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

挪威北方海军总司令曾将我介绍给俄罗斯北方舰队指挥官做口译，我尚未

① “这样的普京”，一起歌唱（流行组合），2002。

② BBC 采访，1984 年 10 月 17 号；参见：www.margaretthatcher.org。

③ 采访，圣彼得堡，2003 年 6 月。

来得及翻译，这位指挥官便对我吼道：“你还站在这里干嘛？还不赶快开始翻译！”他使用了通常对熟人才用的俄语人称代词“ty”，而没有使用更为尊敬的代词“vy”。尽管他拥有高级军衔，我还是觉得受到冒犯。在他身边待了几个小时后，晚餐时间思绪才恢复过来：对自己说，已经完成翻译工作是时候离开了。在研究领域也一样，至少直到我取得博士学位和一份不错的高级职务情况才有所好转。俄罗斯研究所主任曾说，必须去与那些像我一样无足轻重的人相处是一件十分令人羞辱的事——在我第一份研究工作中，曾经被要求与他建立联系。但他从未与我有过任何眼神交流，也从未叫过我的名字。

兹兰诺夫不会那样待人。他会向你投来坚定友好的目光，会称呼你的名字，并使用正式的人称代词“你”。他对我工作的细节很感兴趣，作为回报他会谈论他与挪威长期、密切的关系，会说起他到过的那些沿海的偏远地方，以及一些很友好的挪威朋友。我们谈论着彼此都熟识的人、海边的生活、各自的家庭以及种种话题，甚至谈论到以后可以合作写文章。不久后，兹兰诺夫问我是否愿意为俄罗斯最著名的渔业刊物撰稿，编辑是他众多职业之一。我的文章如期刊登在该刊封面。按照兹兰诺夫的建议，文章主题是关于俄挪在渔业部门的合作，讲述了两国成功的长期伙伴关系。

* * *

本书深入研究了俄罗斯反对巴伦支海划界协议问题，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俄罗斯国家身份这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本书的主要论点在于，该协议的反对者和支持者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讲述俄罗斯在世界中应有的地位，不仅是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他们也利用叙述材料来充实各自的案例以获公众支持。第二章全面介绍了管辖权与巴伦支海的渔业管理，不仅基于二手文献，也有本人参与巴伦支海渔业管理体制的亲身经历。第三章充实了俄罗斯反对该协议的细节，主要参考资料来源于俄罗斯媒体。接下来两章讨论了俄罗斯眼中的西方，尤其是对斯堪的纳维亚的看法。这些章节的写作主要以访谈为基础，访谈对象包括俄罗斯公务员、记者、科学家、其他与西方有合作的群体（见第四章）以及科拉半岛上的普通民众（见第五章）。第六章涉及对于北极政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俄罗斯国家身份这几个方面的综合性思考。

第二章 巴伦支海的管辖权和 渔业管理

摘要：本章对巴伦支海的管辖权和渔业管理进行概述。自从 1976 年以来，挪威与俄罗斯已一起对这一地区的主要鱼类资源进行成功管理，其中两国管理当局之间，以及挪威执行机构与俄罗斯渔民之间一贯轻松而积极的关系可资证明。20 世纪 90 年代末，两国间这种轻松积极关系的基调有所减弱。俄罗斯人抱怨存在歧视，并怀疑挪威心怀把俄罗斯渔民从巴伦支海和斯瓦尔巴德群岛驱逐出去的全面规划。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两国之间建设性的氛围重现，因为挪威与俄罗斯在许多领域达成妥协，其中的两个领域与建立鱼类配额和在本地区采取措施打击过度捕捞有关。

巴伦支海是世界上渔业资源最丰富的渔场之一。这并非夸大其辞：在每年的大海封冻季和化冰季，都有富含营养的沉积物被搅拌起来，这些沉积物上的浮游植物长势很茂盛；沉积物丰富了从鳕鱼一直往上到小口鳕鱼的整个食物链；就此而言，也丰富了人们的食物链。这里最重要的商业鱼类（commercial stock）是东北北冰洋鳕鱼，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鳕鱼鱼类；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挪威和俄罗斯两国一直以伙伴关系的方式对此进行管理。

1988 年，我首度与巴伦支海不期而遇，作为刚毕业的军队语言学家，当时受雇于挪威北部的海岸警卫队。那是一月份一个漆黑的傍晚，当时一艘 KV 诺能号（KV Nornen）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从我们中队所在的索特兰德（Sortland）港基地出航。出港湾后，虽然依旧在近海，但船却开始摇晃得厉害。我好奇地对自己说道：“这算摇晃得厉害呢，还是不怎么样？”最终这被证明属于不厉害的摇晃一类。经过数日后的海上波涛汹涌之后，大海复归平静，而我也能够在暗淡的日光中从船的右舷，首次目睹灰白霜冻的斯瓦尔巴德群岛海岸。就像平时一年中的这个时间一样，苏联捕鱼舰队在更远的南边、在挪威大陆海岸之外。

在春季鳕鱼沿罗弗敦（Lofoten）群岛产卵渔场来回迁移后，俄罗斯人就掉头向北来到斯瓦尔巴德群岛（Svalbard）的周边水域——这是一片鳕鱼苗得到滋养栖息的重要水域。我大部分时间待在船上，以便习惯巴伦支海上的紧张生活。这里水波与环绕我生长的挪威南方海岸水波长度完全不一样。但我作为翻译在苏联拖网渔船上的首次仪式（rite de passage），是在我们环绕斯瓦尔巴德群岛航行一周后驶向挪威大陆的返程途中进行的。“挪威海岸警卫队诺能级舰呼叫苏联拖网渔船 MB-0140 号，”我通过高频无线电（VHF radio）试探性地喊道，“我们将立即登船检查你船。你们是否反对？”我已从美国海岸警卫队翻译训练手册上学会了要讲什么。“不反对，”苏联拖网渔船船长通过沙沙作响的无线电回答道，“我们为什么要反对？”我立即学会了用一种不那么正式的语调说话。我们乘坐一艘小船（craft）过去，小船随波上下起伏，我们就好像在波状地带上驾车行驶一般；我未曾想过波浪会有这么长，而不仅仅只是浪头高。苏联拖网渔船已在船边为挪威检查人员和我放下绳梯（Jacob's ladder）登船。平生第一次，就在浪峰在身下打过的时候，我试图耍着花样跳上绳梯。让我诧异的是，虽然没啥问题就上船了，但是海岸警卫队的生活比我曾想象过的更为令人激动。我在船上了；我第一次踏足苏联领土，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踏足苏联，但至少置身于这一苏联环境中的苏联人之间了，这里有宣传海报，列宁雕像，俄罗斯人的声音、食品和气味。在舰桥下的柔和灯光里，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俄罗斯船长制作了按要求备用的文件，我们阅读了写得工工整整的航海观测日记（catch logbook）。我们在甲板上进行检查，察看渔网的筛孔大小、吊索带以及鱼的长度；我们参观了冷冻室并试图估摸船上有多少鱼；我们填写了检查表。船长用肉丸和俄罗斯黑麦面包招待我们用晚餐。船长说他正在读波利斯·帕斯特纳柯（Pasternak）1975 年的诺贝尔奖小说《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该书只是最近才在苏联出版；由于我自己刚读此书，因此我们相处得挺好——这是从一种有节制而超然的意义上说的。船长感谢我们光临，并欢迎我们再次光临。

大约在 14 天的巡航中途，船长把我叫到他的船舱——这些壮观的海岸警卫队舰船在高层甲板上为船长自己配备了几乎整整一个小套间，他要教会我那些有关巴伦支海管辖权的问题。我们坐在咖啡桌边，他边写边解释。我曾听说过灰色区域（Grey Zone），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还是个六年级中学生（sixth

former) 的时候, 这曾是个最受欢迎的作文主题。这个主题叫人心烦得很, 我当时绞尽脑汁想弄明白它是什么。船长向我介绍斯瓦尔巴德群岛周边的渔业保护区, 这是挪威政府单边划定的, 至今还没有别国政府予以承认。我完全不明白, 为什么挪威政府不让《斯瓦尔巴德条约》适用于该群岛的周边水域? 而为什么其他国家的政府要使之适用呢? 难道《斯瓦尔巴德条约》没有捍卫挪威的利益? 毕竟, 该条约赋予我们拥有群岛的主权。虽然似乎记住了船长讲到的挪威-苏联渔业委员会, 但在那时我还是懵懵懂懂的。直到在巴伦支海数年的实际工作之后, 我才弄明白分界线、保护区以及渔业委员会的意思。

* * *

沿着挪威北部海岸的那些社区居民, 传统上依靠巴伦支海的鱼类为生, 就像生活在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沿岸的居民 (Pomors) 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推动经济工业化的因素之一, 是科拉半岛 (Kola Peninsula) 的“殖民化” (colonization); 这一进程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大大加快。在几十年的时间里, 科拉半岛的人口从数千人增加到已经超过一百万人。渔业是主要产业。随着一支相当现代的捕鱼船队建立起来, 大多数最重要的渔业协会和加工厂也在 20 世纪 20 年代得以建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这支渔业船队驶向全世界的七大海, 或至少是非洲和南美洲的海岸外。但巴伦支海是该船队的后院; 而在战后的一段时期里, 挪威和苏联船舶控制了巴伦支海的渔业, 英国则位居第三。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 在不断增加的捕鱼船队, 且其效率不断提高的压力下, 世界在鱼类资源上显而易见承受重压。同样显而易见的是, 海洋资源的冲突使得国际关系不稳定。1973 年,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大会除召集讨论其他事情之外, 还对允许沿岸国家延伸其领水 (territorial waters) 之外的管辖权问题进行讨论。^① 虽然这一问题在 1958 年和 1960 年的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大会被提了出来, 但是各方并未对协议达成统一立场。现在时机成熟了, 数年之后——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大会继续召开, 直到 1982 年才签署公约, 各方同意给予沿岸国 200 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在此专属区内, 沿岸国享有排他性的勘探、获取和管

^① 严格地说, 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大会之前, 规则并不清晰, 关于领土和其他功能 (有限的) 区的国家实践各不相同。于 1960 年召开的联合国海洋法大会, 虽然试图就领土和 6 海里功能区方面分别达成妥协, 但是在随后的那些年里失败了; 因为有几个国家设立的 (功能性) 捕鱼区超出了其领水范围——虽然超出的范围宽度不一。如今, 各国有权将其领水延伸到离海岸 12 海里的地方。

理海洋资源的权利，而实际目的是指渔业资源。如果鱼群介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这些国家的政府被指令共同加以管理。

挪威和苏联已接受管理巴伦支海共有鱼群的可能性。挪威与苏联渔业部长已就此主题讨论过数次。该海域目前由多边性的大西洋东北渔业委员会（North-East Atlantic Fisheries Commission, NEAFC）管理；该委员会的保留权安排以及经常使用多数决策程序，阻碍了监管实施的效率。例如，捕鱼配额需得到三分之二成员国的支持才能够被采纳。再例如，直到 1974 年其任期快要结束时，大西洋东北渔业委员会才设法设定巴伦支海鳕鱼配额；到那时候，该委员会还约束自己不去对像渔网筛孔大小这样的技术性问题进行监管。挪威与苏联渔业当局抓住由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提供的机会，在那一年的秋季签署了共同管理巴伦支海共同资源的议定书；两国共同的挪威—苏联渔业委员会（the Joint Norwegian-Soviet Fisheries Commission）得以建立，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 1976 年召开。^①

* * *

挪威与苏联已经就巴伦支海的重要商业鱼群——鳕鱼和小口鳕——进行平分达成一致。挪威曾建议自己拥有更多的百分比份额，因为挪威水域比苏联水域的鱼更多。但毕竟苏联是个超级大国，而两国平分，在心理上（至少在后来）有利于使双方客观地将这些资源看作是“我们共同遗产”的组成部分；挪威拥有更多份额，将使之成为一种不公平划分的例子。除了确定下来鳕鱼和小口鳕的配额外，并不是马上就清楚各方希望该委员会真正做什么。在第一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建议就挪威一家报纸称之为“所谓水产养殖——即非自然养殖的鱼”^②——一起进行工作讨论；挪威人则加以阻止。但是，体现挪威-苏联该时期关系更为关键的本质问题，乃是巴伦支海的管辖权问题。

1976 年冬季和 1977 年春季，挪威和苏联分别设立了各自的 200 海里管辖区：挪威设立的是经济区，苏联设立的是临时捕鱼区——1984 年使之正式成为经济区。双方已知就如何确定他们各自管辖区之间的边界问题上有不同立场。

^① 关于该渔业委员会工作总体评估，参见盖尔·荷内兰德所著的《促使渔业协议发挥作用：协议签署后巴伦支海上的讨价还价》一书（Cheltenham: Edward Elgar）。本章是在该书的基础上写成的。

^② 《北方之光报》，1976 年 10 月 20 日。

在如何划分巴伦支海大陆架——也即海床及海床之下的一切东西——的方式上，他们此前已经会谈过几年了。他们同意以 1958 年的《大陆架公约》为基础开始讨论。该公约提供了三阶段分级式的规则（rocket of rules），用以规范各国政府应如何确定它们大陆架各自部分之间的边界。第一，各国可根据协议自由确定边界。虽然这听起来十分明白无误，但关键强调的是也适用于在此区域订立契约的自由。也就是说，当时各方可采用无论哪种最适合他们的安排方式，而不用担心外来各方会宣称协议无效，或在实际上不公平或有歧视性。第二，如果各方不能就分界线达成一致，中线原则（median line principle）则将适用；也就是说，按照这种方法，离岸分界线将由陆上边界的走向确定。更技术性地讲，中线乃是海上一连串的点，其与陆上边界两边的距离都相等。第三，如果要达到特殊情形目的，《大陆架公约》允许各国背离中线原则。

挪威在会谈中向苏方代表推动中线原则，苏联人则持反对观点，认为要依照特殊情形来处理。所谓特殊情形乃是这一地区对苏联的战略重要性：其最大的海军舰队北方舰队就驻扎在那里，可以进入巴伦支海。边界两边的人口数量悬殊；到那时候为止，科拉半岛的居民超过一百万，超过挪威边界那边芬马克县（Finnmark county）人口的十倍以上。再者，苏联人早在 1926 年就主张自己拥有北冰洋东边和西边扇形线（sector lines）之间所有的岛屿（后来还有水域）。所谓的扇形线是指陆上边界终点与北极相连的经线。这即是苏联相对于挪威的官方立场。简单地说，挪威坚持中线原则，苏联则坚持扇形线原则。挪威偏好的原则将使得挪威得到更大的份额，这并不令人吃惊，苏联偏好的原则也是如此。

随着经济区的建立，海洋边界成了巴伦支海大陆架划分谈判中的一个内容。由于认识到没有可能立即解决问题，因此挪威和苏联同意在部分争议地区做出临时性安排——挪威立即将此命名为灰色区域（图 2.1）。在灰色区域内，挪威可以对那些拥有挪威颁发过许可证的挪威船只和第三国船只进行检查。苏联人可以控制他们自己的船只，而且还有得到他们许可捕鱼的第三国船只。虽然灰色区域被时常与争议区相混淆，但只是组织监察两国捕鱼活动的方式而已，与石油和天然气毫无关联。进而言之，灰色区域与争议区域在地理上不能扩及到相同空间。诚然，灰色区域确实与争议区域南边的那些部分相重叠，但在西面（即扇形线以西）有一小片楔形水域延伸到了挪威的无争议水域，而在东面（即

中线以东) 则有一小片楔形水域延伸到了苏联的无争议水域。这主要是因为挪威和苏联两国需要这一灰色区域, 以覆盖这些自然渔场——也就是说, 要覆盖全部捕鱼岸堤而不使之被割裂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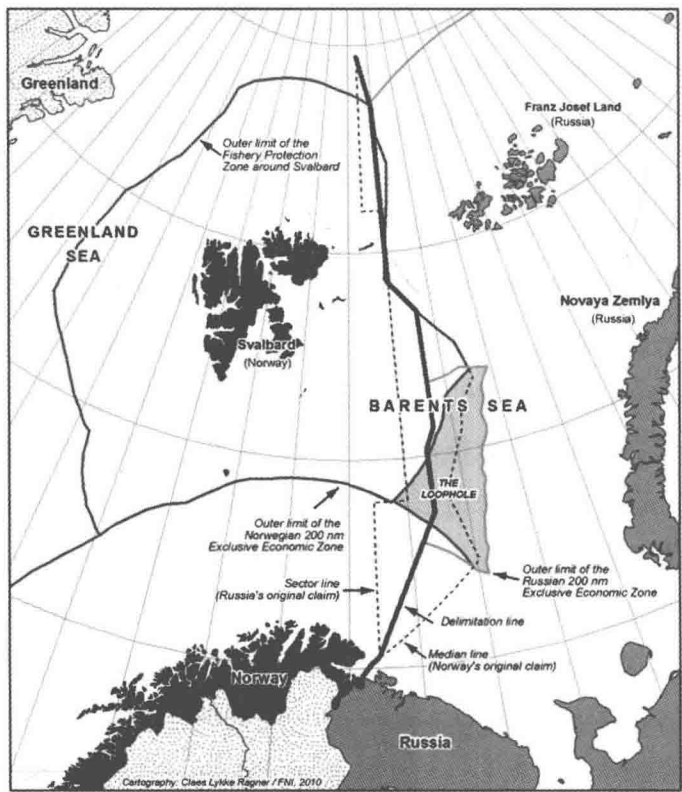


图 2.1 巴伦支海的区域结构

版权所有：挪威南森研究所（Fridtjof Nansen Institute）

灰色区域协定一年一次有效, 每年重新开始, 直到划界条约在 2011 年生效, 这使得灰色区域协定变得多余了。40 年里, 挪威与苏联在极度保密状态下时断时续地讨论海洋边界问题。然而, 与人们所相信的流行看法相反, 灰色区域协定自始至终贯彻得完美无缺。这并非挪威与苏联为那些有关巴伦支海更寻常管辖权问题进行战斗的场所。

* * *

巴伦支海的渔业无论什么时候吸引挪威或俄罗斯媒体的注意, 通常都是涉及斯瓦尔巴德群岛周边的渔业保护区。因此, 它的争议在签署划界条约之后,

下一章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讨论这一话题。但是，为了了解围绕此保护区——下文称斯瓦尔巴德区或保护区——的争议性，我们需要了解斯瓦尔巴德群岛本身的法律地位，也就是说，构成这片陆地的群岛及其所处领水的法律地位。

我们今天所称之为斯瓦尔巴德的群岛，是由荷兰探险家维勒穆·巴伦支（Willem Barentz）于1596年发现的。虽然他试图探索沿俄罗斯北方海岸的东北通道，但却因撞上一个岛屿的陡峭山峰而发生了事故。他将此岛命名为斯匹次卑尔根岛（Spitzbergen）。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斯匹次卑尔根岛——这是挪威语和英语的拼法——吸引了来自欧洲几个国家的猎人。煤炭储备在19世纪末被发现，从而使得采矿业兴起。在国际社会的眼里，它从一个不起眼的荒无人烟之地，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起因是诸如需要设立执行机构以管辖矿工这样平淡乏味的事情；尤其在星期六晚上，矿工们通常最后都是喝得烂醉、大声嚷嚷。20世纪初，就斯匹次卑尔根群岛问题在挪威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Kristiania）先后于1910年、1912年和1914年安排了三次国际会议，目的是要为该群岛设计一个政府系统。虽然其目的主要不是授予某个特定国家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拥有主权——相反，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不同意那样做，而是讨论责任分担问题。举行第四次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会议的计划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被扼杀了。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斯匹次卑尔根群岛问题几乎是偶然出现的。魏德尔·艾阿尔斯伯格（Wedel Iarlsberg）伯爵是个好管闲事的挪威外交官，他劝说那些大国处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地位问题，并给予挪威对该群岛拥有主权，用来部分地补偿战争期间挪威商船船队遭受的损失。从政治上来说这是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因为莫斯科没有人出席巴黎和会，而鉴于该群岛战略上的重要性，莫斯科肯定会反对此方案。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自己同德国达成了和平协定，因而被排除在战后解决问题的会谈之外。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的最终行动中夺取了权力，因而不被其他大国承认是俄国的合法统治者。

然而，挪威对斯瓦尔巴德群岛的管辖权有三个重要附加条件。第一，禁止建立军事要塞和任何与战争相关的活动；第二，挪威的征税不得高于管理该群岛的费用；第三，也就是有关保护区地位争议的原因——所有《斯瓦尔巴德条约》缔约国的公民和公司，应享有挪威公民和公司在该群岛上进行海洋活动、采矿活动和商业活动的同等权利。

《斯瓦尔巴德条约》于1920年在巴黎签署，五年后生效。与此同时，挪威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给该群岛起名为斯瓦尔巴德，意即“寒冷海岸之地”。

*

*

*

苏联在1924年毫无保留地承认了挪威对斯瓦尔巴德群岛拥有主权，主要原因是挪威乃第一个承认苏联的西方国家。苏联于1922年成立，布尔什维克在内战和经济混乱之后，在原沙俄帝国大部分地区巩固了自己的权力。1935年，苏联加入了《斯瓦尔巴德条约》。苏联已在一个被称之为格鲁曼特（Grumant）的定居点采矿，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并且于1932年在巴伦支堡（Barentsburg）开设新矿。苏联的定居点与挪威在那儿最大的朗伊尔城（Longyearbyen）——该镇得名于那个矿区的第一位拥有者约翰·M. 朗耶（John M. Longyear），实际上都是南伊斯佛得海湾（Isfjord）的相邻社区。挪威在奈-阿历桑德（Ny-Alesund）镇以北以及斯维阿（Svea）镇更南的地方有矿区；而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苏联沿海湾更远的地方建立了被称之为皮拉米德（Pyramid，意为金字塔）的矿区。几十年来，即便挪威人与俄罗斯人在斯瓦尔巴德群岛上的社区相距仅一步之遥，但他们之间却绝少来往。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才谨慎地迈出了挪威在苏联城镇执行管辖权的步伐，那毕竟是挪威毫无争议的领土。^①

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了海洋法的巨变。就像在上文提到的那样，这为挪威与苏联建立巴伦支海双边渔业管理机制提供了良机，使得划界会谈的范围从只集中关注大陆架，扩大到水柱区（water column）——大陆架之上的水域。而这又回过头来促成了灰色区域的创设。但一个远远更加难以驾驭的新问题出现在前面，是有关斯瓦尔巴德群岛周边更北面的水域问题。

北冰洋东北的鳕鱼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片水域。简单地说，鳕鱼在斯瓦尔巴德群岛西面和北部水域长大成熟。那毫无疑问，排除这些水域的任何管理形式都是无效的。挪威经济区只向北延伸到紧靠波尔岛（Bear Island）南边的某个点——大约位于斯匹次卑尔根岛（斯瓦尔巴德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南端与挪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俄罗斯有关斯瓦尔巴德群岛政策的评论，参见J. H. 约尔根森（J. H. Jørgensen, 2010）所著的一书《俄罗斯斯瓦尔巴德群岛政策：从另一方看斯瓦尔巴德群岛》（Russisk svalbardpolitikk: Svalbard sett fra den andre siden）（Trondheim: Tapir）。

威大陆的中间。

而挪威的政治立场是认为也可以在斯瓦尔巴德群岛周围建立自己的经济区。就像对其大陆周围的经济区监管渔业活动一样,挪威在那儿也将有权这样做。但与传统上在此地区捕鱼的那些国家进行的试探性会谈结果是,对挪威的支持少得可怜。^①他们抗议道,《斯瓦尔巴德条约》平等对待条款也适用于斯瓦尔巴德群岛之外的水域,而不仅仅是该片陆地以及沿岸狭长的领水一带。然而,挪威坚持条约中的实际措辞——其中根本没有提及额外的领水。但其他国家的政府认为,话虽如此,但当1920年条约签订时,在那些水域并没有深水捕鱼;如果当时有深水捕鱼的话,这一区域显然会被包括在条约范围之内。双方的观点都可以在国际法中得到某些支持。在评估各方观点后,国际法庭可能选择对措辞进行类推性诠释;也就是说,将相关条款的范围扩大到条约中措词虽未明言,但却可以合理推定倾向于被包括在内的地区;或者在对政策进行考虑之后,可以合理推定其在条款范围之内地区。

挪威提出的中间解决方案,是在斯瓦尔巴德群岛周围设立200海里渔业保护区。与经济区不同,渔业保护区并不是海洋法中明确界定的类别。作为实践中的权宜之计,虽然海洋法并不禁止这样做,但在法律上却没有真正的内容。苏联拒绝给予承认,直到今天,俄罗斯的官方观点依然认为斯瓦尔巴德群岛周边的水域为国际水域。但保护区确实为该区域的鱼类提供了保护措施。挪威再次对捕鱼活动进行监管,其他在该区域有利益的国家对此予以默认。然而,无论什么时候挪威海岸警卫队扣留他们的船只时,他们都不再克制了。如果他们不进行抗议,那么挪威的行政主权将获得法律上的合理性,而《斯瓦尔巴德条约》的平等对待条款将靠边站了。^②虽然苏联当局命令其渔民不签署挪威海岸警卫队使用的表格,但却允许对其船只进行检查。只要他们继续将鱼群看作是公共资源,那么他们的方法就有其逻辑性。事实上,斯瓦尔巴德群岛周围水域的鱼群得到保护不仅有利于挪威,而且当然也有利于苏联。就像在下文看到的那样,

^① 这种局面持续至今;参见T. 彼得森(T. Pedersen, 2008)的文章《斯瓦尔巴德群岛离岸区的政治限制》(The Constrained Politics of the Svalbard offshore Area),《海洋政策》(Marine Policy)第32期,第913-919页;T. 彼得森(2008)的文章《挪威对斯瓦尔巴德群岛的统治:加紧对北冰洋岛屿的控制》(Norway's Rule on Svalbard: Tightening the Grip on the Arctic Islands),《极地纪录》(Polar Record),第45期,第147-152页。

^② 这一观点的逻辑并不完全清楚。人们可以说,只要挪威和外国船只在该地区被扣留,挪威的实践活动就等同于条约。这一观点的核心是其他国家的政府无权影响该区域的规则或捕鱼配额。

俄罗斯人后来坚持认为挪威与苏联之间达成了君子协定，即虽然挪威对苏联/俄罗斯船只进行检查，但却要克制自己不扣留这些船只。

* * *

1988年夏，我完全致力于围绕保护区规则执行的实际问题之中。夏秋两季是俄罗斯渔船船队在斯瓦尔巴德群岛周围水域的捕鱼季高峰，因为那时候鳕鱼从产卵场所离开挪威海岸向北迁徙。数以百计的苏联拖网渔船在保护区里捕鱼，通常是几十条渔船一组。KV 安德尼斯号（KV Andenes）是挪威海军北角级（Nordkapp class）三大旗舰之一，负责监察斯瓦尔巴德群岛区的活动。在透亮的北极夏光和午夜太阳光里，我们吃力地从一艘船攀登上另一艘船进行检查、记录、争论和谈判。新船军官和渔业官员——巨型北角级旗舰拥有自己由资深官员带领的渔业团队——教导我们如何进行登上苏联拖网渔船：坚定而不含糊，但态度友好。虽然我们不知道苏联渔民不会在检查表上签字，但是我们还得出示表格，并以平静且尽量不与之争吵的方式叫他们签字。如果他们拒绝签字——这当然是他们惯常所做的，我们就记录下来，以制止进一步的争吵。而就像往常一样，我们虽然应该严肃而有礼貌，但也应该善于观察和细致周到。

在北方渔场那些紧张日子的期间，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挪威海岸警卫队检查人员与苏联渔民之间意气相投的语调。虽然这些检查并不完全是监视者遇上可能的冒犯者，但来自不同国家的北极同事各自职责不一却相互尊重，遇上时则轻松地聊聊天。渔民们按照要求让检查者查验捕获量日志（catch log）、渔具、最后一网的鲜鱼捕获量，以及手头的鱼储量。我们谈论天气和海况。哪里有最佳捕鱼场所？你们在哪里最不可能冒间接捕获小鱼的风险？好天气还将持续吗？检查通常花上几个小时，有时甚至长达一天。人们喝茶、分享家庭照片、解决世界问题、交流生活中的故事。有人漫不经心地弹起了吉他，我们抽着纸烟（papirosy，一种苏联时期烧焦的纸烟）。我们扳手腕，下棋。在极地的长夜里，共同情感变得尤其强烈。路途上会有风暴吗？冰川将从东面漂移过来吗？当挪威检查者拿出检查表要求签名的时刻来临时，苏联船长总是说（头略略往前斜倾、双手交叉），“抱歉，虽然我真的很愿意在上面签名，但这是我们那些政客们的问题。你和我都是水手、相互尊重，但你知道那些政客，他们总是争论个没完。”

当处理特别重要的管辖权挑战问题时，挪威海岸警卫队与苏联渔民之间的这种友好融洽的关系证明特别管用：当顺带捕获的小鱼超过一定限制时，说服渔船队移到别的地方去。如果小鱼量超过每千克捕获量的一定数额，按照规则要求渔民换地方捕鱼。在多春鱼和虾类渔业中，由于使用细筛孔的网，小鳕鱼被顺带捕获尤其是个问题，因为这会对北巴伦支海鳕鱼至关重要的滋养区的鳕鱼渔业资源造成许多损害。使这一问题更加恶化的，是难以强迫违反者遵守规则。当捕获的鱼被拖上船只时，检查者须登船并命令船长把船开往别处。监管以随机抽查为基础；在所有时间将检查人员部署到巴伦支海上所有那些数以百计的船上显然不可能。而由于挪威不在斯瓦尔巴德群岛区逮捕冒犯者——挪威不能够像在专属经济区那样对类似效应进行控制措施，如在一定时期内关闭渔场，以避免外国政府将此保护区合法性问题带到国际法庭的局面出现，因为那样做挪威不一定能赢，因此检查工作真是难上加难。问题是不要使局面不可收拾。

因此，如果挪威海岸警卫队想阻止小鱼被顺带捕获，他们就需要找到其他办法。而那种办法就是通过掷地有声的理论一番和诉诸常识来说服船长。他们向对方解释不捕获小鱼的好处；通过选择对话路径，他们也显示自己对对方的尊重和渴望与之保持良好关系。事件通常以这样的方式展开：海岸警卫队检察员发现有一次打捞中小鱼太多；海岸警卫队在该地区加强监控，以弄明白这是一次性发生的事情还是更大范围的趋势性证据。在后一种情况中，海岸警卫队由于缺乏强制执行的法律手段，因此会尝试说服渔民转到别的渔场去。由于海岸警卫队不能关闭斯瓦尔巴德群岛区捕鱼的渔场（他们在专属经济区却能够这样做），因此他们创造出我们那时称之为“避免捕鱼区”的方法：换言之，我们可以要求渔船队避免在某些地区捕鱼。由于在斯瓦尔巴德群岛地区打鱼的多数船只来自苏联——挪威将自己的鳕鱼配额分配给离大陆海岸线打鱼的小船，因此被要求离开的大都是苏联船只。作为翻译人员，我被下令用无线电传递要求——苏联人极少直接回复的要求，以及用书写方式表明我们不希望他们打鱼的地区。检查员在检查时把这些书面要求转达给他们。

然而，更加关键的是检查期间进行沟通时的措词用语。挪威检查员可能进入船长室与其计算一下，如果不能阻止小鱼顺带被捕获，那么鱼储量可能较少——以及可能减少的捕鱼机会。如果鱼储量下降，而不要直接提及该船长自